

英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福利国家制度

□ 陈晓律

没有工业革命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现代化便失去了存在的物质基础。但在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工业化产生的巨大贫富差距以及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给就业和民生带来了极度的不稳定。福利国家制度便是西方国家为了缓解这些问题而设置的一种社会协调机制，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运用，成为西方国家治理社会的重要工具。它的主要内容是由国家出面给社会成员提供各种“保底”服务，以使社会在一个更为富裕的基础上更加公平稳定。就英国而言，福利国家制度的建立，既是英国现代化的产物，也是其成为现代化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然而，福利国家制度在助推英国走向现代化的同时，也引发了种种弊病。

《贝弗里奇报告》勾勒出英国福利国家制度的蓝图

早在近代初期，英国的无业游民和贫困问题就迫使英国政府以各种济贫的方式加以解决。1601年英国颁布的《伊丽莎白济贫法》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关社会救济的法律。当时英国在进行圈地运动以后，偷盗者、乞讨者增多，社会不安因素急剧增加，为了稳定社会情绪，维持统治，英国王室在1601年颁布了《伊丽莎白济贫法》。这部法律规定凡年老者可在家中接受救济；贫困儿童可在他人家中寄养，成年后可去做学徒；流浪者被关进监狱或送去教养院。但从英国现代化进程来看，《伊丽莎白济贫法》的救济效果并不理想。二战时期是英国真正开始探索建立福利国家制度的关键时期。1941年，贝弗里奇受政府委托，负责制定一项战后社会保障计划。贝弗里奇吸收了当时有关“国民社会保障权利”的观点，并将这种观点融入制定的计划中。1942年，他以《社会保障及有关服务》为题发表了这个计划（即《贝弗里奇报告》）。《贝弗里奇报告》以消除贫困、疾苦、肮脏、无知和懒散五大社会病害为目标，主张建立一个全社会的公民保障制度，让每个公民都享有医疗保健、养老金等权利，而不仅局限于穷人。贝弗里奇在报告中提出了三个原则：一是普遍性原则，即社会保障实行的范围不限于社会的贫困阶层，而应该包括所有公民；二是政府统一管理原则，即政府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形式组织实施社

会保障措施；三是全面保障原则，即所谓“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体系。《贝弗里奇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预防人们中断或丧失挣钱的能力，提供生育、结婚及死亡等所需的费用。新的社会保障计划应承担三个基本任务：一是为所有15岁以下的儿童提供补助或让所有的儿童接受全日制教育直到16岁。二是为社会所有成员提供合适的医疗卫生和康复设施以防止疾病和治疗疾病，使他们能够保持或者恢复工作能力。三是维持就业，也就是说避免群众性失业。1942年11月《贝弗里奇报告》正式出版，报告在英国引起强烈反响，并成为英国现代社会保障福利体系的蓝图。

福利国家制度的建立让英国公民获得现代化社会福利保障

二战期间，英国政府出台了許多社会保障服务，战后政府很难将战时已经提供的社会服务再收回去。此外，战后英国的经济经历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直保持着2.2%左右的增长率，这些为英国福利国家制度的建立、长期实施福利政策提供了有利条件。1946年，以《贝弗里奇报告》为基础，英国政府通过了《国民保险法》和《国民医疗保健服务法》。1948年，英国政府制定了《国民扶助法》，废除了运行数百年的《伊丽莎白济贫法》。与此同时，把统一处理的济贫政策按其功能进行了分割，即把经济扶助的责任移交给中央政府，并让地方当局按照个别需求为贫困的居民提供福利。换言之，英国政府已经用全国统一的、集中的福利提供方式取代了旧有的、分散的、地方性的福利提供方式。因此，在1948年，工党政府宣布英国已经构建起福利国家，使社会保障制度化了。其基本内容包括：一是全民保障。保障范围几乎无所不包。二是各种保障待遇都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强调了社会保障的平等性与普遍性。三是政府统一管理，全国最高领导机构是卫生和社会保障部。四是社会保障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一般性税收。这也成为英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事件。英国在战后逐渐形成的以国民卫生医

疗服务、个人社会服务及社会保障为支柱的社会福利体系，不但帮助低收入阶层获得基本生存的保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贫富分化，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英国的社会面貌。自此以后，每个英国公民可以享受到一种基本的但却是现代化的社会福利保障。它不仅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而且也提高了人们对自已国家的认同。

过度发展的高福利制度给英国现代化带来诸多弊病

然而，福利国家制度的普遍性原则是与英国公民的普选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产生了一个怪圈：战后工党和保守党为了获得更多的选票、争取大选的胜利，在福利项目上互相攀比，花样翻新，致使历年的福利开支呈现只能增不能减的局面。英国社会保障权益项目越来越多，社会保障标准越定越高，支出不断增长，很大程度上致使英国国家财政屡次陷入困境。据官方《国民收入与支出》统计，1951年福利支出为20.74亿英镑，到1982年竟增至685.1亿英镑。扣除英镑贬值及通货膨胀因素，增长了2.7倍，而同期国内生产总值仅增加了1倍。入不敷出本已成为福利国家的包袱，但雪上加霜的是，为了争取选民赢得大选，两党还不断地扩大福利的范围，导致财政支出不断增加。“财政收入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在50年代和60年代内（1951—1970年），平均每年为97.07%。这就是说，虽然有赤字，但所占比例并不算很大。但70年代前六年（1971—1976年），英国平均每年财政收入在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降到83.5%。这表明了英国财政状况的恶化。”英国工党和保守党为拉选票致使福利开支陷入只能增不能减的困境，让英国的福利国家体系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这样的情况下，英国政府本应通过各种政策和经济举措，对经济与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进行协调。在社会福利方面则必须由政府来发挥提供、引导和监督的决定性作用，不能幻想通过市场来自动调节社会福利的分配，更不能推卸政府的责任。然而，结果却往往令人失望，因为历届英国政府，在解决福利国家危机的过程中，表现得并不理想。其中一个主要原因，还是对选票

和选举结果的考量。任何一届英国政府关心的，始终是选举获胜，而将其他东西放在次要位置。换言之，如何获取选票一直是英国政府的中心任务，也是其执政原则，其他的事情，相对而言都没有足够的分量。因此，这样选出来的政府，在应对福利国家弊病方面只能是一个无所作为的政府，很难从社会发展必须与经济发展同步这个源头，来解决日益高涨、不切实际的过度福利给国家财政带来的巨大压力。事实证明，民主选举制度与福利国家制度捆绑在一起，造就了英国福利国家制度改革无法破解的怪圈。与政府未能充分履行科学合理分配福利的权责相伴，福利国家制度的实施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比如平摊式分享福利和消费福利、福利机构的官僚化和自我膨胀趋势、制定不切实际的“过度福利化”标准等。更严重的问题在于，过度发展的高福利制度对整个英国的人口再生产带来了巨大的威胁。福利国家制度的建立，使每个英国公民的生活都有了可靠的保障，但也在无形中使传统的家庭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趋于解体。英国青年一代在免除衣食的困扰后，不仅对生产，对人口的再生产也产生了厌倦，不希望简单重复老一代人的生活方式。随之而来的便是英国越来越低的生育率，以及由此产生的劳动力缺乏和人口老龄化加剧等问题。随着英国福利国家制度的完善，英国的人口结构开始发生了变化。根据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调查，1901年时，14岁以下的婴幼儿和少年占比为32.4%，65岁以上的人口仅为4.7%；1991年时，14岁以下的婴幼儿和少年只占19.1%，65岁以上的人口则占15.9%。这一老龄化的趋势在21世纪变得尤为明显。年轻人的不婚不育行为，使英国从1987年开始，出现了和平时期的第一次人口下降。这些问题的产生，不能不说是英国福利国家制度的一种悲哀，它们也成为英国现代化进程中难以摆脱和有效解决的弊病。

为界分为两大部分。在围壕（沟）内侧，发现呈“围沟”状和片状分布的多处生产生活区，发掘出丰富的房址、灰坑、陶窑、墓葬等遗迹和大量遗物。在围壕（沟）外侧，西、南部发现疑似“道路”、大面积“人工堆土”和其他丰富遗存，总面积近百万平方米。遗址所在的洮河谷地南端，还分布着数十处同时期不同规模的遗址，形成了一处马家窑文化聚落群。寺洼遗址在其中属引领者，是目前已知规模最大的马家窑文化中心性聚落。

见证中国史前彩陶艺术巅峰。马家窑文化最引人瞩目的文物是精美绝伦、绚丽多彩的彩陶。寺洼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马家窑文化彩陶，其线条优美、似水波般灵动，常常会有游动的鱼、飞翔的鸟、栩栩如生的人面，笔锋所至，宛如一幅幅图画，光彩照人。这些彩陶用料之考究、造型之优美、构思之精巧、纹饰之绚丽、烧制之精良，都达到了极高水准。

在聚落围壕（沟）内侧，还发现了马家窑文化的陶窑、作坊、储泥坑、陶泥、制陶工具和烧制废品等诸多与制陶相关的遗迹和遗物，可以确定寺洼遗址马家窑文化聚落内存在多处制陶区，且布局新颖，在马家窑文化中属首次发现。鉴于制陶规模较大、生产水平高超、延续时间较长，不排除这是一处区域性制陶中心。有研究者提出，马家窑文化彩陶存在商品化生产，可流通至周边，乃至远距离贸易到青藏高原、川西北地区，成为其生业经济的重要支柱。寺洼遗址之外，结合其他马家窑文化遗址的资料，可知马家窑文化彩陶在延续时长、分布范围、绝对数量、相对比例、精美程度等多个方面，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谓是中国史前彩陶的集大成者，达到了史前彩陶艺术的巅峰。

引领黄河上游史前社会发展。农业经济的基础和史前彩陶的发达，支撑了马家窑社会发展的新高度。考古证据显示，马家窑文化和马家窑社会在多个方面已经达到相当高的发展水平和文明化程度，是黄

寺洼遗址位于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寺洼山村，为寺洼文化命名地。遗址文化内涵丰富，包含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寺洼文化以及辛店文化遗存，面积约200万平方米。2018—202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在遗址开展7次发掘，发现并发掘出一处马家窑文化中心性聚落，展现了黄河上游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新高度，成为认识黄河上游早期文明化进程的新起点。

马家窑文化重要的中心性聚落。马家窑文化是我国史前时期最重要的考古学文化之一，主要分布在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洮河、湟水、渭河一带，范围涉及今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陕西、四川等地，距今约5000—4000年，以彩陶生产和使用为鲜明特色，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持久且深远的影响，其相关研究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具有填补西北地区空白的重要意义。寺洼遗址马家窑文化聚落是目前已知马家窑文化最重要的中心性聚落，其内涵极为丰富。现已发现三重长方形围壕（沟）、近百座房址、大量灰坑窖穴、十余座陶窑和数座墓葬，另有疑似“道路”和大面积“人工堆土”的线索，在多个方面取得重要突破：首次发现史前时期三重长方形布局的围壕（沟）；首次发现马家窑文化大规模制陶区；首次发现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大型聚落。

聚落以长方形围壕（沟）为界分为两大部分。在围壕（沟）内侧，发现呈“围沟”状和片状分布的多处生产生活区，发掘出丰富的房址、灰坑、陶窑、墓葬等遗迹和大量遗物。在围壕（沟）外侧，西、南部发现疑似“道路”、大面积“人工堆土”和其他丰富遗存，总面积近百万平方米。遗址所在的洮河谷地南端，还分布着数十处同时期不同规模的遗址，形成了一处马家窑文化聚落群。寺洼遗址在其中属引领者，是目前已知规模最大的马家窑文化中心性聚落。见证中国史前彩陶艺术巅峰。马家窑文化最引人瞩目的文物是精美绝伦、绚丽多彩的彩陶。寺洼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马家窑文化彩陶，其线条优美、似水波般灵动，常常会有游动的鱼、飞翔的鸟、栩栩如生的人面，笔锋所至，宛如一幅幅图画，光彩照人。这些彩陶用料之考究、造型之优美、构思之精巧、纹饰之绚丽、烧制之精良，都达到了极高水准。在聚落围壕（沟）内侧，还发现了马家窑文化的陶窑、作坊、储泥坑、陶泥、制陶工具和烧制废品等诸多与制陶相关的遗迹和遗物，可以确定寺洼遗址马家窑文化聚落内存在多处制陶区，且布局新颖，在马家窑文化中属首次发现。鉴于制陶规模较大、生产水平高超、延续时间较长，不排除这是一处区域性制陶中心。有研究者提出，马家窑文化彩陶存在商品化生产，可流通至周边，乃至远距离贸易到青藏高原、川西北地区，成为其生业经济的重要支柱。寺洼遗址之外，结合其他马家窑文化遗址的资料，可知马家窑文化彩陶在延续时长、分布范围、绝对数量、相对比例、精美程度等多个方面，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谓是中国史前彩陶的集大成者，达到了史前彩陶艺术的巅峰。

总而言之，寺洼遗址马家窑文化聚落展现了5000年前生活在黄河上游黄土高坡、穿梭在黄河与黄土之间的马家窑先民创造的远古荣光。他们承续仰韶文化，创造了史前彩陶艺术的巅峰，成为黄河上游史前社会发展的引领者，并向西北进入河西走廊，开辟了东西方交流的早期通道。以寺洼遗址马家窑文化聚落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展现了中华文明西部高地早期社会的发展水平和文明化程度，彰显了黄河上游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新高度，其西北特色丰富了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多元一体”格局，填补了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西北地区关键时期的空白，成为认识黄河上游早期文明化进程的新起点，实证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寺洼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

寺洼遗址马家窑文化聚落：黄河上游早期文明发展的新高度

□ 郭志委

黄河上游史前社会发展的引领者。除上述史前彩陶巅峰之外，寺洼遗址马家窑文化聚落最新发现的三重长方形大型围壕（沟）也是上述认识的有力证据。

三重围壕（沟）整体近东西、南北方向，平行分布，直角转弯，形制和布局相当规整，东西长约610米，南北宽约440米，内部复原面积近30万平方米。中圈和外圈是兼具防御和排水功能的“围壕”，内圈沟内发现丰富的生产生活遗迹和遗物，其防御功能不甚突出，可能有更为复杂的功能。多处见有通道，且大致对应，应是经过精心规划和测量后修建的大型工程，是目前已知国内最早的多重长方形布局的围壕（沟）结构。这项大型工程表明马家窑社会已具备相当高的社会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围壕（沟）外侧还发现“疑似道路”和“夯土建筑”的线索，不排除有高等级建筑或其他重要遗迹存在的可能，体现出寺洼遗址马家窑文化聚落的精心规划、丰富内涵和所达到的文明化程度，彰显了马家窑社会的发展高度和文明化程度，堪称黄河上游史前社会发展的引领者。

玉琮传播：我国史前时期的广域文化认同

□ 刘文强

我国史前时期的广域文化认同主要有三次。第一次为庙底沟文化彩陶的广域传播，发生在距今5500年前后。第二次为玉琮的传播，从距今约5000年新石器时代末期开始，一直延续至夏商时期。范围涉及环太湖流域、长江中游、长江上游、黄河中游、黄河下游、黄河上游、珠江流域、海河流域等我国大多数区域，出土地点遍布浙江、江苏、上海、四川等20个省区市。第三次为牙璋的传播，发生在距今约4300年至西周时期。其中，玉琮传播涉及的范围最广，存续时间最长，史前先民及后世人群对其文化认同也最为广泛。截至目前，我国年代最早的玉琮遗物，为良渚文化早期的玉琮，绝对年代在距今5300—5000年之间。这批玉琮从一开始，便有着统一的器形及复杂的结构。整体呈内圆外方的筒形，器中有圆形的孔部，孔部之外突出的一圈矮圆柱形部位为玉琮的射部，上下射部相连接形成的筒状结构之外有四角突出的角部，角部之间为凹平的槽体（也称直槽），角部本身可分为一节或多节，每节的节面之上均刻画有风格统一的纹饰。良渚文化的玉琮，开创了我国玉琮类器物的先河，也开启了玉琮不断向外传播，最终覆盖我国史前时期大部分区域的历史过往。距今5300—5000年之间，玉琮在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中最先出现；距今约5000—4400年之间，在江淮地区的潜山薛家岗遗址、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区域、黄河中游的庙底沟二期文化、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中，已经出现了玉琮；距

今约4400—4300年之后的龙山时代晚期，黄河中游晋南、陕北及内蒙古南部的史前文化，以及珠江流域的石峡文化、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海河流域及海岱地区的龙山文化中，也都出现了玉琮。至夏商时期，玉琮又扩散至了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闽北霞浦黄瓜山等地。玉琮的传播，以及其传播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形制差异等特点，其实和良渚玉琮的制作有着密切的关系。良渚文化早期玉琮的制作可分为5个主要的步骤，依次为制坯、钻孔、制作出射部、制作出槽体、雕刻纹饰。从制坯到雕刻纹饰的这5个步骤，不仅还原了玉琮的制作工序，也揭示了我国古代玉琮的基本类型，阐释出了玉琮制作工序与器形之间的重要关系，并显示出了玉琮在传播过程中的一些特点或现象。玉琮的传播存在两个主要特征，其一是制作工艺的衰减，其二是文化认同的扩展。工艺衰减的“衰”是指客观上玉琮制作工艺的衰退，是相对于良渚玉琮制作工艺而言。如良渚文化之外，其余考古学文化的玉琮，器形均多停留在钻孔或制作出射部的步骤，也大多没有纹饰，部分刻画纹饰的玉琮，其纹饰也远无良渚文化玉琮纹饰那般繁缛精美。“减”指主观上工序或工艺复杂程度的缩减，即在工艺衰退的可能性之外，也存在另一种情况，其他文化人群觉得玉琮没有必要做得那样复杂，主观上省略掉了良渚文化玉琮的部分工序或缩减了复杂程度。当然，有时“衰”与“减”两种情况可能共存。正是玉琮传播中工艺的衰减，造成了不同考古学文化中

玉琮形制不尽相同这一现象，且由近及远，玉琮制作工艺的衰减愈发明显。如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或黄河中游陶寺文化的玉琮有时还会制作槽体并刻画简单的纹饰；晋南清凉寺遗址及陕北石峁文化中也能见到制作完整或简化的槽体，但没有纹饰的玉琮；而更远的甘青等地及大多数商周玉琮则多停留在了只钻出孔部或制作出射部的器形，且大多数玉琮射部也只是四角进行简单切割，使其有一个射部的形状而已。玉琮传播随着距离及年代差距渐远，工艺几乎同步衰减，器形也相应地更加简单。玉琮传播的另一个主要特征是文化认同的扩展。玉琮文化认同的扩展，其实肇始于良渚文化的扩张。而良渚文化的扩张，则表现为原生良渚文化玉琮、玉璧等器物的向外扩散。以原生良渚文化玉琮为例，其除了在良渚文化腹地的环太湖流域大量发现外，在长江中游的江西丰城、珠江流域的曲江石峡、淮河流域的新沂花江、黄河流域的偃师二里头、长江上游的成都金沙等遗址也均有出土，形制同环太湖流域的相应器物完全一样。原生良渚文化器物远距离向外输出并持久扩散，即便其背后不一定有良渚文化人群的同步移动，但也显示出其强大的对外文化辐射及文化影响。其结果之一，便是促成了我国新石器时代末期先民，对玉琮类器物及相应文化的广域文化认同。当然，如同工艺衰减所体现的玉琮形制变化一样，非良渚文化人群对玉琮的文化认同，也并不等同于对良渚玉琮背后文化的全部吸收。正如其余考古学文化多未复制良渚玉琮纹饰一